



# 召公奭

马保春

召公奭是周武王灭纣后旋即分封的燕地的。作为周初封国之君的召公奭，地位很高。《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可见，召公奭是同姜尚公、周公、弟叔鲜、弟叔度一起被封的，可见其地位之高。这也源于此前召公就拥有的重要政治地位。

召公奭是周之宗族，姬姓。相传年岁高长，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跨周王朝立国前后。在周王朝的立国、巩固新生国家的事业中，曾立下过汗马功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周代人物。又因为他是燕国名义上的始封君，所以也是燕国史、北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召公奭的历史事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与周公一起辅佐周文王发展周族，把先周国族推向了强盛。（2）辅佐周武王灭商，因战功封于北燕（并未就封，仍然留居镐京，巩固新生政权）。（3）周成王时协同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之乱。（4）筹划营建东都雒邑，威慑中国。

## 一、周王朝建立前的召公

姬姓周族始祖后稷，名弃，曾居于邰，后传不窟，不窟之孙公刘迁于豳，九传至古公亶父，又迁于岐下。后来古公亶父幼子季历即位，是为公季，公季子姬昌继位，是为周文王，号称“西伯”。周文王时期，周族在周公、召公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势力大大发展，于是又把居住中心从岐下东徙于渭水南岸的丰水西岸。正是由于召公在发展周族势力上贡献巨大，所以当时的周文王就把他和周公封到周族曾经盘踞过的岐下一带，一方面是对他们的奖赏，一方面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为周族的发展贡献力量，以巩固此前已经占领的岐下之地。《诗经·周南·召南》前郑玄诗谱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



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由此可知，召公之所以和周公一起被委以重命，以守岐邦，说明召公当有才能、有功绩，所以才能担当此守卫故土的重任。而召公奭之所以称“召公”，也正是由于他食采于召的缘故，看来他的称号是由封地的地名而得来的。《史记·燕召公世家》开篇索隐云：“召者，畿内(采)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其中，“召”地在今陕西省岐山县西南8里<sup>①</sup>。这是召公第一次得封的采地，到了周武王时期被封于北燕，则是在周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地域广大的天下而所接受的第二次分封。召公初被封于召地，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治理才能，留下了良好的影响。《史记·燕召公世家》又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这就是很好的明证，说明召公奭在治理民众方面很有才能，成就突出，影响深远。

## 二、辅佐周武王灭商、继立成王

周文王死后，武王继位。召公仍然和周公等人一起继续辅佐武王。《史记·周本纪》：“武王继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在武王继位后的十年时间里，周族在召公等人的经营之下，发展很迅速，很快就达到了灭商的实力。在武王十一年的时候，周公、召公辅佐周武王，组织军队，发兵东方，牧野一战，一举灭商。《史记·鲁世家》载：“(武王)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

正是由于召公等人有如此重要的战功，所以在周王朝建立后，他们屡屡被委以重任。灭商后不久，武王驾崩，成王继位，成王年幼，有周公、召公为左右辅佐成王。《尚书·君奭》：“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其中的“保”当是指太保，“师”是太师。周初官制中有“三公”，曰太师、曰太保、曰太傅，都是仅次于周王的重要官职。召公既为“太保”，足见其地位之高。《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是召公管理周人的本土，周公负责周人新拓展的领土。这可能是周人在建国初期实际有效控制地区的一种划分。并不是全国的领土一分为二，那样，以陕地为界线也有点分配不均。因为按照九州的划分，陕地以西仅雍州之地，其他绝大多数的州地当在陕地以东，

<sup>①</sup> 杨宽：《古史论文选集》，1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所以历史上有人怀疑过此事。不管怎样，周初召公既然能和周公这样显赫的人物并举，并分陕而治周地，正体现出了他的地位和威信。

### 三、协周公东征，继而封燕

周武王灭纣后，将商都朝歌封给了纣子武庚禄父，以续商祀。后又以朝歌为节点，将其周围之地三分，朝歌以北叫“邶”，封于武王之弟管叔鲜；朝歌以南谓“鄘”，封于武王弟蔡叔度；朝歌之东谓之“卫”，封于武王弟霍叔。环朝歌而踞之，以监视武庚，故又称“三监”。不久后，武王驾崩，由其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由周公辅政，掌周朝之大权。周公在排行上低于管叔鲜，成王年幼而由周公辅政，管叔鲜不服，并怀疑周公有篡权之嫌疑。所以他联合三监中的其他两个，即蔡叔度、霍叔，与武庚传统，并联合东方的淮夷、奄等部族，起兵反对周王朝，发动叛乱，实际上是反对周公。成王派周公东向镇压，平定叛乱。这就是周初历史上有名的“三监”与武庚叛乱，周公东征的事件。

在这次东征“三监”与武庚的叛乱中，召公协同周公共同出兵。《史记·周本纪》：“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又《逸周书·作雒解》：“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说的就是召公和周公一起平定周初叛乱，稳定政局的事情。而且在协助周公平定东方叛乱的斗争中，召公曾一度依太行山北上，控制过东方北部的政局，似乎已经达到了今北京地区。所以，在东方平定了叛乱之后，召公就被封于北燕。

王宇信先生曾指出，召公被封于北燕的时间，可能在成王时期平定东方叛乱之后。虽然《史记·周本纪》上明言“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召公于北燕”，王宇信先生认为，这可能是后来史书上所讲的“宏观武王”时期，即周王朝建立并巩固的时期，应当至少包括武王和成王两个王世。由此理解，召公很有可能就是在成王时期、他和周公一起平定了东方叛乱之后，被封于北燕的，因为此前他主自陕以西的周人故土。但据有些史书的记载，他本人并没有就封，而是由他的长子实际来到燕地主持封国事宜。有学者指出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遗址黄土坡墓葬M1193所出的青铜器“克盃”、“克罍”铭文中的“克”当是人名，即召公的长子，是实地就封到燕地的第一代燕侯。而召公仍然留在宗周故地，以辅佐周王建设周王朝。

### 四、营建东都雒邑

新生的周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早在武王时期，就曾筹划过要在洛



水流域建设新都的事宜。可惜武王早崩，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个愿望。成王时期，可能在周公东征之后，由召公、周公等人开始了建设成周雒邑的事业。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雒邑，如武王之意。”可见营建雒邑的前期准备工作是由召公来开始做的。《史记·鲁周公世家》也有类似的记载，其云：“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这更加明确的说明了在营建雒邑的过程中，召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尚书·召诰》记载过召公受成王命先期来到雒地所做的事情，其云：

成王在丰，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月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若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

《召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召公在洛地后的工作，先占卜，以取得在洛地建邑适合与否的上天神灵的旨意，结果取得了佳兆。于是召公便细察地形山川，确定营建雒邑的具体位置和国邑内宫殿建筑的布局情况。此后，周公亦赶到此地，与召公一起进行雒邑的营建。这是周初召公为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事业又做出的一大贡献。

雒邑建成后，周王朝派驻“成周八师”以驻守，并迁部分殷顽民至此，以削弱、分散、监视他们的势力，从而达到巩固周王朝的目的。这样的功勋确实有召公的一部分。此后，召公就一直留任宗周故地，继续为周朝的兴旺发达做着贡献。

据一些文献的记载，周初的王侯级人物，多有长寿者，而召公就是其中之一。召公经历了文、武、成、康四世，肯定是长寿的。《论衡·气寿篇》云：“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时，尚为太保，出入百有余岁矣。”由此可见，召公岁数可能过百。又《风俗通·六国篇》：“燕召公奭……寿百九十余，乃卒。”有 190 岁，似乎有夸张的成分。但据《轮岗·气寿篇》所言，如果召公是长于周公，而周公先于召公死的，周公据说活到了 99 岁，这样推算，召公过百岁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今本竹书纪年》云：“（周康王二十四年），召康公薨”。可见在康王的二十四年，召公才薨。加上康王在位的二十四年，召公至少 123 岁。



周初的历史上，召公可谓显赫也，其薨后，墓葬在何处，也是个千古谜团。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遗址发现后，特别是黄土坡墓葬的1193号墓葬，由于规格很高，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这个墓葬可能就是名义上的第一代燕侯召公的墓葬<sup>①</sup>。当然这还可以再讨论。因为文献上讲，召公的墓不在燕地。《三辅故事》：“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皆葬毕陌南北。”毕，当是今陕西省毕原。这个记载看来，如果召公真正来到了燕地，也会像周公、姜子牙一样，归葬宗周故地。这个问题只能留待以后解决了。

总之，召公在周初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而对于燕国来说，更是关键和重要，因为他是燕国名义的始封君。所以，我们在谈论燕地或者说北京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的时候，不能不关注这个曾经在西周初年的政治舞台上纵横驰骋的英雄。而且召公在后来史学家的评论中，也是多多赢得了褒奖之辞。《史记·燕召公世家》太史公曰：

召公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外迫蛮貉，内错齐、晋，崎岖强国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

司马迁的评述中，似乎把燕国崎岖强国之间，几乎数度灭亡，但又为姬姓最后一个灭亡的诸侯国等历史事实归功于召公先世修来的福分，虽然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的色彩，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召公的为人处世，道出了他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积极作用，不愧是一代英豪，是北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sup>①</sup> 般玮璋：《新出土的太保器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1990(1)。